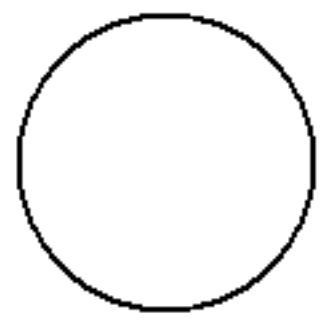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20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二十期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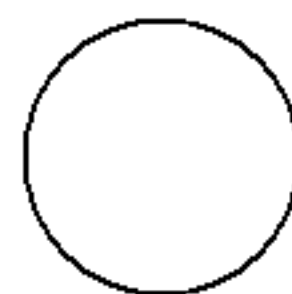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1)
-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2)
-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4)
-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6)
-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7)
-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 (9)
-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10)
-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12)
- 驳“种族论”和“黄祸论” (13)
-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15)

“灵活反应”战略——一条紧勒着美帝国主义

- 脖子的绞索 范 地 (17)
- 一股革命的火焰在燃烧 施央千 (28)
- 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薄一波 (34)

☆ 十月二十二日出版 ☆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下，曾经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帝国主义者再也不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大火。帝国主义的旧的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连天的前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在有些国家已经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摇摇欲坠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在本国的统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相互呼应，是我们时代的响彻云霄的凯歌。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风暴，要求当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在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面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这是造反，这是不许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这是革命，这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挠的历史潮流”。

对这个当代世界政治的最尖锐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积极支持民族解放



运动。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边，千方百计地否定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领导在口头上，还不敢完全丢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有的时候，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也采取某些行动来装潢一下门面。但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从他们多年来鼓吹的一系列论点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他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的是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和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花了很大力气，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进一步证明了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革命的立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苏共领导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吧。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能不能说，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已经结束了呢？

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斗争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苏共领导却经常散布一种论调，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经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们强调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呻吟”，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这些地方留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

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先看一看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吧。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许多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

再听一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又說：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美国的投資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價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貴产品的购买者”。“金錢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約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搶走我們的一千块美元，就給我們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謂帝国主义的价格。”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絕沒有放棄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統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們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統治和殖民剝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組織軍事集团，建立軍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經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們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們利用經濟“援助”等方式，繼續把这些国家作为他們的商品銷售市場、原料供应地和資本輸出的場所，掠奪这些国家的財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們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对这些国家进行軍事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們不能用“和平”手段維持对这些国家的統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軍事政变，进行顛复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攬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險、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請問苏共領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說消灭殖民主义已經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苏共領導为了給自己的謊言辯护，竟然想从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他們說，一九六〇年声明不是說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嗎？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制度迅速瓦解的論点，并不能給苏共領導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論点帮什么忙。声明明确地揭露了：“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拚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剝削”，他們“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經濟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里，声明揭露的东西，恰恰是苏共領導力图掩飾的东西。

苏共領導还制造了一个“理論”，說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謂經濟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們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領域展开的”；現在，經濟問題已經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

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絕不是像苏共領導所說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漲，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們国家中的势力，爭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彻底独立。这



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



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又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饿、疾病和文盲状态。”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



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远景”。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〇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谁来消除呢？”

这句话问得实在离奇！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鲁晓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们向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们的政府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会议的代表发出呼吁：让我们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管理制度的步骤，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可见，赫鲁晓夫所说的指望联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统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论，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在这里，赫鲁晓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们的刺刀进行残暴统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赫鲁晓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须“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说，是借维护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錯誤观点和錯誤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棄爭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們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來說，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魯曉夫就曾經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問題，当作是法国的“內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談到阿尔及利亚問題时說：“我考慮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內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見法国《費加罗报》記者时又說：“我們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苏共领导为了討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經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給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臉。而苏共领导却还要拿耻辱来进行夸耀，硬說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果实，也应该記在他們的那本所謂“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来看看苏共领导在剛果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他們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剛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剛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贊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軍去剛果的決議，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剛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为联合国軍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魯曉夫在致卡薩武布和卢蒙巴的电报中竟然說，“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苏联的报刊不断地贊揚联合国“帮助剛果共和国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期待联合国“采取坚决的措施”。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苏联政府两次发表的声明，还为镇压剛果人民的联合国大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苏共领导又推动基贊加去参加在联合国軍“保护”下召开的剛果議会和参加傀儡政府。苏共领导当时竟然欺騙說，剛果議会的召开是“年輕共和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胜利”。

事实很清楚，苏共领导的这些錯誤政策給美帝国主义侵略剛果帮了大忙。卢蒙巴被杀害，基贊加被拘禁，許多爱国者遭到迫害，剛果民族独立斗争遇到挫折，对于这些，苏共领导难道一点也不感到自己的責任嗎？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言行，遭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苏共领导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必要的教訓，改变他們的錯誤路綫和



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一系列誣蔑和攻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理論”。公开信說，“根据这种理論，我們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階級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首先，这是捏造。我們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的矛盾，資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階級同资产階級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壟断資本集团同壟断資本集团之間的矛盾。

我們还指出，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銳的。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的矛盾。

我們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

我們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論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們是这样說的，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統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区。”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階級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統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說来，整个国际无产階級革命事业，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轉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絕不是一个区域性的問題，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階級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問題。”

这些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也都是从現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来的結論。

誰都不能否认，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



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轉移的。我們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資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臟地区，由于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偉大日子，終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經說过：“极大的世界風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現出来了。”“我們現在正处在这些風暴盛行及其反轉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百八十三頁。）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說过：“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銳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九十二頁。）

难道列宁和斯大林的話都說錯了嗎？这些道理本来早已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識。显然，当苏共領導一心要貶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就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碼常識，連眼前的十分清楚的事实，都統統不顧了。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領導权思想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在无产階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領導权問題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論点。公开信說：“中国同志竟想‘糾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階級，而是小資产階級或民族資产階級，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貴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領導。”

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的明目張胆的歪曲。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須坚持无产階級領導权的时候說，历史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无产階級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爭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爭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階級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层，組織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統一战綫。这个統一战綫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階級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領導权”。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須建立广泛的反帝統一战綫的时候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願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們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小資产階級，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資产階級，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貴族”。

我們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清楚的。必須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无产階級的領導权，同时



又必須建立广泛的反帝統一战綫，这究竟有什么不对呢？苏共领导为什么要歪曲和攻击我們的这些正确观点呢？

背棄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不是我們，恰恰是苏共领导。

按照苏共领导的錯誤路綫，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而把这个旗帜拱手送給別人。这样，还談得上什么反帝統一战綫呢？又談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

苏共领导还經常宣揚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像尼赫魯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設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十万八千里了。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社会主义陣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之間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說成民族解放运动应当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来“领导”。他們居然还硬說这是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为“根据”的。这显然是对于列宁思想的极大歪曲和篡改。这反映了苏共领导是要把他們的取消革命的路綫强加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苏共领导在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中，企图給中国共产党加上一个罪名，說中国同志“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他們还攻击我們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隔离”起来，“对立”起来。还有像法共领导人那样的共产党人，也摹仿苏共领导的腔調，跟着大喊大叫。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陣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不是別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自己。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我們一向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場出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来看待民族解放运动。我們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陣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有极其偉大的作用。

但是，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却不願意承认这种作用。他們只讲社会主义陣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陣营的支援作用。他們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貶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場，是違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錯誤的。



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须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苏共领导却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结束。他们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服从他们的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指出，取消主义危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斯大林描绘取消主义者的想法是：“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页。）

斯大林的结论说，“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

现在的苏共领导，比起当时的取消主义者，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以为是聪明人，他们尽干那些“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他们非常害怕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纠纷，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迷恋于所谓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确定“势力范围”。

斯大林批评取消主义者的这番话，正好是对现在的苏共领导的一幅画像。他们正是这样步取消主义者的后尘，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斯大林当时警告说，“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



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斯大林的这个警告，对于今天的苏共领导来说，仍然具有严重的现实意义。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被压迫民族的援助下，才有更大的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亿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末，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三十八页。）

但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恰恰是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共领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方面，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法国的控制和束缚不进行坚决的反对，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给戴高乐等人；另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维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不支持并且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反对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堕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

列宁说过，“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页。）但是，以多列士同志为代表的法共领导不仅仅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而且公然把法属殖民地的人民统统看成是“非法国血统的法国人”，不承认他们有同法国分离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并且公然支持法帝国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

十几年来法共领导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九四六年，当法国垄断资本统治者玩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提出建立法兰西联邦的时候，他们就跟着鼓吹：“我们一贯把法兰西联邦看作是自由人民的自由联盟”，“建立法兰西联邦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解决法国人民和过去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各地人民的关系问题”。一九五八年，当法兰西联邦垮台，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国殖民体系，提出组成“法兰西共同体”的时候，法共领导人又跟着鼓吹：“我们相信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将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不仅这样，法共领导人为了反对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竟然吓唬法属殖民地



人民說：“脱离法兰西联邦的任何企图，虽然可以博得徒有其名的暫时的虛偽的独立，但是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他們还公然說：“問題在于这个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独立，是通过法国来实现，还是不通过它并且反对它。我們国家的利益要求这个独立經過法国来实现。”

在阿尔及利亚問題上，法共领导人更是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立場。最近，法共领导辯解說，他們多年以前就“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由的正当要求”。可是，事实究竟是怎样呢？

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他們跟着法国壟断资产阶级叫喊什么“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叫喊法国“现在是而且将来也应该是一个偉大的非洲强国”。多列士等人最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每年可以向法国提供“一百万头羊”和大量小麦，来解决法国“缺乏肉类”的問題和“补充谷物方面的不足”。

請看，法共领导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是何等狂热啊，在他們那里哪有一絲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呢？哪有一絲一毫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影子呢？他們的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立場，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法国民族利益。

駁“种族論”和“黃禍論”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种族論。他們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場，說成是“建立种族和地理的藩篱”，“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說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見”。

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馬克思列宁主义，說这种謊話，倒还能够騙一騙人。可惜，这种謊話的制造者們生不逢时，現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說得好：列宁主义已經“拆毀了橫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間的墻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百二十二頁。）苏共领导想要重建这道种族主义的墻壁，只能是枉費心机。

当代的民族問題，归根結底，是一个阶级斗争問題，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問題。現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反帝爱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帝爱国的开明人士，結成一条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統一战綫。这条統一战綫，正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这里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种一边，还是站在有色人种一边的問題，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一边，还是站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一边的問題。

被压迫民族必須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模



糊这个界限，才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观点。

列宁说过，“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八十八页。）现在苏共领导诬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是什么“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团结，这分明把自己放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的地位。

苏共领导贩卖“种族论”，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的运动，显然是为了在欧洲和北美洲的白种人中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心理，转移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转移国际工人运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标。

苏共领导到处大喊大叫，说什么“黄祸”呀，“成吉思汗的威胁又来了”呀，这实在不值得一驳。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〇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

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闹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闹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闹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识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领导喧嚷的一套“黄祸论”，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为黄祸论者”。

德国的威廉皇帝宣扬“黄祸论”，是为了进一步瓜分中国，侵略亚洲，镇压亚洲的革命，转移欧洲人民革命的视线，并且作为当时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争夺世界霸权的烟幕。

威廉第二宣扬“黄祸论”的时候，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处于极端腐朽和极端反动的时候，正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民主革命席卷中国、土耳其、波斯，并且波及印度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名言。



当时的威廉第二是赫赫一世的大人物，但是，他不过是阳光下的雪人。沒有过多久，这个反动头目連同他制造的反动理論，都一古脑儿冰消瓦解了。而偉大的列宁連同他的光輝的思想，却万古长青。

時間过去了五十年，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更加腐朽了，更加反动了，寿命更加不长了。同时，席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風暴，比列宁在世的时候，不知宏大多少倍。就在这个时候，想不到还有人要扮演威廉第二这个角色，这实在是對历史的嘲弄。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苏共領導在民族殖民地問題上所執行的政策，不是別的，正是破了產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政策。它們之間的不同点仅仅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为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义服务的，而現代修正主义则是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老修正主义是跟着老殖民主义的調子歌唱，赫魯曉夫是跟着新殖民主义的調子歌唱。

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們，曾經是帝国主义的老的殖民統治的辯護士。他們公然說：殖民統治是进步的，它給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他們甚至說，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

在这一点上，赫魯曉夫同老修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罵老殖民主义制度的。

赫魯曉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原来帝国主义的腔調已經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帝国主义被迫認識到“如果西方国家企图維持殖民主义的現狀，必然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敗”。老殖民主义的統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个‘膿疮’，会使国家的生命失去經濟上和道义上的活力”。因此，需要改变方式，实行新殖民主义。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赫魯曉夫就同新殖民主义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揚“殖民主义消失論”，掩飾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劝导被压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义。他十分卖力地宣揚被压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国主义实行所謂“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經濟迅速发展”，“生产力增长”，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場会无比地扩大”，“能够撥出更多的为工业发达国家的經濟所需要的原料，各种产品和商品”。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赫魯曉夫也沒有忘記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武庫中，去搜集那些破爛不堪的武器。

例如：

老修正主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主張民族問題“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和平的方式迈进”。赫魯曉夫在这一方面，更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鉢，主張“平靜地



埋葬殖民主义制度”。

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誹謗“布尔什维克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誹謗“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紅軍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須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并且造謠說，这种局面，“产生了新的世界战争的极大危险”。赫魯曉夫今天誹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使用的語言，正是当年老修正主义者誹謗布尔什维克使用的那些語言。人們很难找到二者之間的区别。

应当說，赫魯曉夫在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效劳方面，比老修正主义在为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效劳方面，做得并没有丝毫逊色。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机会主义派。革命派站在被压迫民族这一边，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同革命派相反，机会主义派依靠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分得一杯殘羹剩飯，喂肥了自己。他們站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

列宁指出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分野，現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而且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出现了。

历史經驗证明，民族解放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須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結成巩固的同盟，也必須同那些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們的影响。

历史經驗证明，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須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結成紧密的同盟，必須同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們的影响。

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列宁說：“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騙人的空話。”（《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九十五頁。）那么，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新殖民主义辯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不管帝国主义怎样伪装，怎样掙扎，也不管新殖民主义的辯护士怎样粉飾，怎样帮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无论如何逃脫不了的。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阻擋的。新殖民主义的辯护士是終究要彻底破产的。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灵活反应”战略——一条紧勒着 美帝国主义脖子的绞索

范 地

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采用了一个新的军事战略，即所谓“灵活反应”战略。这个战略的中心思想是所谓“有控制的反应原则”。这个战略要求美国建立能够进行“核大战”、“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的“多样化军事力量”，以便美国“在几种作战计划中，选择最有利的那一级战争”。这个战略在发展尖端武器，进行“核讹诈”，准备最后与它的敌国作决战等方面，同它的前届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基本是一样的。其区别在于，这个战略在加强核军备的同时，还积极发展常规兵力。

肯尼迪等人认为，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由于只强调“原子报复力量”的作用，而忽视常规武力的作用，因此，不能“适应现代复杂的国际局势”，使美国到处失败。而“灵活反应”战略则克服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军事战略的“缺点”。这个战略，一方面大力发展核军备，把核力量作为反对它的敌国，控制其“盟国”，支持常规战争和所谓“特种战争”的“王牌”；另一方面，又不忽视常规武力的重要作用。他们妄图采用这个战略对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日益高涨的人民革命运动，压倒他们的敌国，并且妄图消

灭或颠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最后达到独霸全世界的罪恶目的。

肯尼迪及其军事领袖们，对他们的“灵活反应”战略大吹大擂。最早鼓吹这一战略的现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灵活反应”战略“既不受任何一种武器系统的拘束，也不受任何一成不变的未来战争概念的拘束”。他又说，这个战略“力主采取一种进取的姿态，以便尽量使战争远离我国海岸。它应使我们的盟国安心，而不是使它们远离”。他认为最得意的是，这个战略能使美国领袖，“在将来历史上某一危急时刻必须决定什么是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适当军事反应时，能有广泛的选择余地”。显然，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军事战略了。

美帝国主义的这个战略，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自己所吹嘘的那样美妙呢？运用这一战略，是不是真的可以挽救他们走向死亡的命运，实现他们统治全世界的野心呢？

不！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之所以必然失败，是由这个战略存在着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决定的。从形式上看，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弥补了前届政府军事战



略的某些“缺点”，但是，实际上它不但不能解决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军事战略的矛盾，而且恰恰相反，更进一步加深了那些矛盾。它的命运，决不会比它的前届政府的军事战略的命运更好些。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无论美帝国主义的核武器或常规兵力，都不可能制止各国人民革命的发展。美国想控制核武器来迫使其“盟国”为它的战略服务，正遭到日益强烈的反抗。同

时，这种既准备“核大战”又发展常规兵力的齐头并进的办法，势必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经济的困难，加深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和统治集团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帝国主义的更大的失败。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肯尼迪的这个“美妙”的“灵活反应”战略的一些主要矛盾，以及美帝国主义执行这个战略以来的不美妙的结果。

一、“靠不住”的新“原则”

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仍然是进行“核讹诈”，积极准备核战争。在这方面，同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内容，基本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肯尼迪政府为了保存美国的“社会结构”，想只杀死别人而不“自杀”，主张采取所谓“不打城市”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以“先发制人”的办法，突然袭击敌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同时以后备攻击力量威胁对方城市，阻止对方回击，迫使对方谈判，以便“寻求有利条款结束战争”。麦克纳马拉把这个办法说成是：“要给予可能的敌人以可以想像的最强烈的刺激力量，使它不打击我们的城市。”

肯尼迪为了实现“不打城市”的原则，除了积极发展核军备以外，还积极发展反导弹武器，大搞所谓“民防”，修建防御放射微粒的“掩蔽所”。肯尼迪表示，美国将“以最大的速度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反导弹防御的可能性”。

对肯尼迪政府的这个“创造”，美国统治阶级内部许多人认为并不聪明。美国一些高级将领、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对这个原则

提出了怀疑。他们说，这个原则“是防务问题智囊人物的不现实的创造”。他们自己也承认：（1）美国“不可能消灭”对方的核反击力量，特别是不可能消灭革命的人民。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认为，“即使是核战争也不一定是摧毁文明的‘亿万人死亡的战争’”。他今年一月在美国国会秘密作证时承认，即使把美国的力量再增加一倍或两倍，也不可能实现消灭他的敌国和消灭世界革命的罪恶目的。（2）一旦爆发“核大战”，对方不会按照美国的如意算盘“不打城市”。（3）攻击军事目标很难不波及城市。美国的许多军事目标都在城市附近，例如，美国的亚利桑纳州的德克逊城周围就有十八个大力神导弹发射阵地。

在发展反导弹武器方面，希望更加渺茫。美国目前还没有有效的防止导弹的手段。美国军方出版的《星条报》一九六三年一月透露：科学家们认为，美国所寄希望的新型奈基-X反导弹武器的研究、发展、制造和部署完竣，还需要十年的时间。美国的一些军事科学家甚至对反导弹武器能否发展成功及



其作用，表示怀疑。

美帝国主义要大搞所谓“民防”，修建防御放射微粒的“掩蔽所”，也遭到人民群众和某些上层统治者的反对。一九六二年一月，美国二十四个州四千多名妇女在白宫附近集会，反对建立微粒“掩蔽所”。美国大财阀、纽约州州长洛克菲勒，曾经提出拨款一亿美元在该州各学校修建“掩蔽所”，由于遭到人民的激烈反对而失败。一九六三年六月初，美国俄勒冈州州议会及该州首府波特兰市市议会，甚至通过决议“取消民防计划”。

同五角大楼有密切联系的美国新闻评论家艾尔索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许多“有思想的人开始对核武器作为国家政策的主要军事工具的价值表示怀疑”。这些人讽刺说：

二、常规战争“决非易事”，而所谓“特种战争”是一场“失望的斗争”

进行常规战争和“特种战争”，这是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中不同于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肯尼迪及其军事将领们，特别重视常规战争和“特种战争”。肯尼迪认为，这种战争已“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而且将变得更加重要”；这种战争，是“冒险性最少的积极手段”。泰勒则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是把“原子报复力量”当“宝剑”，把常规武力当“盾牌”；“灵活反应”战略把“原子报复力量”当“盾牌”，而“有限战争力量则成了可以灵活运用——招架、还刺和进攻——的宝剑。因此，这把宝剑的实质已经具有了一种新的更大的重要性。”

肯尼迪政府为了准备进行常规战争，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的常规兵力，并且，迫使其

“鲍勃·麦克纳马拉是近乎天才的人。他的不打城市的理论是要使核武器合理化的一个杰出尝试。但是，这个理论是靠不住的”。

企图以核武器毁灭别人，而结果把自己置于被毁灭的地位，这是美国过去的军事战略中就已经存在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矛盾，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妄想“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它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而且随着核武器的发展，这个矛盾会越来越深。美国原子科学家拉普，在一九六二年底出版的《屠杀与过度屠杀——全歼的战略》一书中写道：“美国的军事政策在历史上从未遭到现在这样的自我怀疑和矛盾。”这个科学家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美国战争贩子对美国核战略的矛盾心情。

“盟国”和仆从国加紧扩军。肯尼迪在一九六三年国情咨文中说，为了在战略上取得“核毁灭和退却以外的选择，就必须大大加强”常规部队，“这是一项美国同自由世界共同负担的任务”。美国计划把地面部队的兵力，从一九六一年六月的一百零三万五千人，增至一九六三年六月的一百一十五万人。同时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中欧战线的地面部队，由一九六一年的二十一个师，在二年内增加到三十个师。在最近二年多的时期里，美国陆军的作战师已从十一个师增加到十六个师。

常规战争有把握吗？美国要依靠常规武力，“在一场全球性赌博中一试高低”，并不容易。美帝国主义虽然在国外有一百多万驻军和几千架飞机，但是，它们分散驻在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个军事基地里。一旦打起常规



战争，美帝国主义必须到处出动它的常规部队，这就必然造成战线太长，兵力分散，到处挨打的不利形势。

艾尔索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古巴危机时期，“当时曾有人建议使用美国常规武力对付卡斯特罗。这项建议受到考虑。但是，反对直接干涉的一项理由是，在干涉行动中，可能牵制住太多的美国常规武力。据估计，攫取和占领古巴，至少需要六个师军队对付决心抵抗的游击队。这就是说，美国可用的地面部队，将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投到这个岛上。”这个评论员直率地指出：“美国投于自己的军队（尤其是陆军）的金钱和人力，究竟是否能够在战力上多收效果，一直是一个问题。”而且它的欧洲“盟国”、特别是英国，提供炮灰的兴趣很有限。因此，按照艾尔索普的说法是，“选择”常规战争，“决非易事——甚至根本不可能”。

在古巴是如此，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同样如此。这是美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必然结果。美帝国主义的常规兵力即使再多，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核大战是“自杀”，常规战争“决非易事”，都不能冒昧地“选择”。肯尼迪现在已经“选择”并且大于了几年的，是所谓“特种战争”。

在这个所谓“特种战争”中，肯尼迪之流的作为又怎样呢？越南南方是肯尼迪的“特种战争”试验区，就让我们从这里看看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在这方面的情况吧。

美帝国主义为了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简直呕尽心血。他们除了以大量武器和金钱支援吴庭艳傀儡政权以外，还直接参加了这个罪恶勾当。他们不仅研究了各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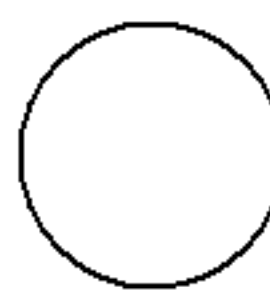
所谓“反游击战战术”，训练了所谓“反游击战”的部队，而且制造了各种新式轻便武器，大量使用直升飞机，甚至使用了化学武器作战。

美帝国主义的“军事观察家”经常吹嘘，“美国的武器、人力和美元正在帮助吴庭艳政府赢得对共产党游击队进行的战争”。但是，美国国务院得出的结论是，“这场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近一年来，美国给吴庭艳反动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共达七亿多美元，派往越南南方的美军官兵达一万五千多名。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起了“运输队”的作用。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用缴获来的大量新式武器装备了自己。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个美国军官说：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拥有金钱能够买得到的一些最好的军事装备。……这是美国造的并由美国出钱买的”。另一个军官说：“我们向作战双方供应物资”。

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紧紧同人民团结在一起，打得敌人狼狽万状，疲于奔命。美国国际合众社在描写美国以直升飞机同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作战的情形时写道：美国“花费了成千上万加仑汽油的直升飞机的袭击，只发现空旷的稻田和没有人烟的村庄”。

《纽约时报》在评论越南南方的战争时写道：“观察越南陆军在湄公河三角洲各省份进行扫荡行动的人，常常对荒无人烟的村庄感到惊奇。军队一来，除掉老年人和儿童外，全都逃走了。没有人提供情报，没有一个人忙着挂旗”。大部分的乡村是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控制的，军队一撤走，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就回来了”。

越南南方人民在美帝国主义这个强大的



敌人面前，毫不畏惧，英勇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一九六二年，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毙伤敌军五万多名，俘虏五千多名，另有三万六千多名吴庭艳的官兵开小差或向人民革命武装投诚。一九六三年头九个月，已经歼灭美军和吴庭艳的反动军队达七万五千多人，其中包括六百多名美军官兵，缴获的武器达七千六百多件，击落和击伤敌人的飞机达三百五十多架，比去年全年击落和击伤的敌机多六倍。现在越南南方四分之三的地区掌握在人民革命武装手里。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巨大胜利，有力地鼓舞了仍被美吴反动集团统治的地方的人民的革命斗争，鼓舞了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的军人和吴庭艳反动统治集团，经常吹嘘他们的“战绩”。他们说“消灭了”多少人民革命武装，“缴获了”多少武器。但是，这种骗人的把戏，现在连美帝国主义自己也不相信了。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最近就不打自招地说，在越南南方

关于人民革命武装伤亡人数的报告“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它们是以空中观察员的估计为基础的……”。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这个道理甚至连帝国主义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了。今年一月五日，《纽约时报》在一篇《直升飞机不能代替人；南越战争暴露了机器时代的缺点》的文章中写道：“不管机器有多么好，也只能帮助和辅助而已，不能代替战场上的使用两条腿和手拿步枪的士兵。”这家报纸悲叹：“美国军人忘了这一点”，而越南南方人民革命武装“知道这一点”。

美帝国主义者在越南南方人民的英勇斗争面前，一方面继续加紧镇压，同时，对这场战争已公开表示没有信心。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肯尼迪承认，在越南南方的战争中，美国是在一条看不到头的地道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则说，在越南南方“预料要进行一场长期、激烈和令人失望的斗争”。

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又失败了。

三、西欧的伙伴们“对美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基础”“打了好几拳”

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由于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不能不引起美国战争贩子的“自我怀疑”和这个战略的失败。这是美帝国主义十分伤心的。但是，使美帝国主义更伤心的，是由于推行这个战略，使它的西欧“盟国”，更加众叛亲离。

美国资产阶级报纸评论家李普曼，在评论戴高乐反对美国核战略这一问题时写道：“戴高乐对美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基础打了一拳。”艾尔索普则认为：“事实上他不止打

了一拳而是打了好几拳”。人们可以根据事实，再补充一句，不仅戴高乐打了好几拳，而且英国、西德和美国在西欧的其他一些“盟国”，也一拳一拳地打击着美国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基础。

很久以来，美帝国主义就企图以核武器来控制其西欧“盟国”。美国为了不让其西欧“盟国”、主要是英国和法国有独立的核力量，竭力推行一种叫作“多边核力量”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把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统统



納入由美国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通过这个組織，剝夺英国和法国在核力量方面的独立，造成它們对美国的依賴。这个計劃一直遭到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对。

一九六二年，美英拿騷協議以后，美国提出由二十五艘海面舰只，配备二百枚北极星導彈，組成“多边核力量”。其中規定，核彈头由美国掌握，参加国不得撤出其力量等等。这就是泰勒所吹嘘的让“盟国”“安心”而不“远离”的办法。但是，美国的这个办法并没有使它的西欧“盟国”感到“安心”，而是感到可怕。英、法两国的評論一再指出，这是美国山姆大叔的“巧妙圈套”，如果上了这个“圈套”，就会使自己淪为“二等国”的可悲地位。

英国对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計劃，存在着极大的恐惧。一方面，它怕西德参加了，会抬高西德的地位而降低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怕自己参加以后，丧失独立地位。英国《卫报》在綜述英国对“多边核力量”計劃的态度时写道：“沒有人支持这一力量”。理由是：一、“这对我們的防务是不必要的”；二、“作为还击武器，水面舰只不大可能有什么价值”；三、“在有限战争中水面舰只显然比潜艇的效力差得多”；四、“成本太大，估計建立这支力量需要五亿英镑，这就意味着国防預算只有二十亿英镑不到的英国，不得不放棄我們国防力量的某些重要部分来支持一項等于是外交、政治計劃的东西”；五、“由于美国人仍拥有否决权，因此，扳机上还是美国的手指”。这家报纸断言：“‘多边核力量’将造成北大西洋联盟的进一步分裂。”

一直梦想当西欧領袖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对美国利用“多边核力量”控制法国的企

图更为惱火，反对更甚。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戴高乐在記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法国坚持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并且鼓吹建立一个同美国对抗的“在經濟上也在政治上軍事上团结的欧洲”。戴高乐宣布，这是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基本目标之一。

一九六三年五月，美国为了推行它的“多边核力量”計劃，召开了渥太华會議。戴高乐不但不服从美国指揮，相反，在會議后公然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撤退了自己的舰队，以作为在明年进行氢彈試驗的时候防护試驗区之用。

戴高乐一再声称：“法国不会作美国的卫星国”，“法国无需保护者”，“真正的盟国是并不向人点头哈腰的”。法国总理蓬皮杜則公开宣称：“我們敌人（指美国——作者注）的意图是明显的。他們要迫使我們放棄威懾力量，因此，今天斥責这种力量是无用的玩具，明天又斥責这种力量有无法估計的致命后果”。法国《民族报》更以同美国完全对抗的口气煽动：“如果人們真正希望欧洲存在，并事实上在世界上起作用，就只有在經濟、政治、防务三个方面保持团结才行，……这是欧洲共同体的命运所系，誰要是拒絕这些方面的一个方面，誰就没有一点共同体精神。”

美帝国主义在推行它的“多边核力量”計劃中，对西德寄予的希望特别大。美国企图以此使西德分担軍費，并进一步扶持西德的軍国主义势力，为自己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卖命。西德則企图借此来获得核武器。但是，西德也不甘心受美国的控制。因此，西德一方面表示“决心”同它的“盟国”一起，“大力推行”“多边核力量”的計劃；另一方



面，又声称“法国关于欧洲成立原子力量的提法是‘值得考虑的’和‘重要的’”。几年以前，法国和西德就签订了“法德条约”。西德前总理阿登纳同戴高乐之间往来密切，互相吹捧。阿登纳“发现戴高乐将军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那些能看到事物本质而不是只看到事物外表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戴高乐则为阿登纳的健康“干杯”，使阿登纳“这位年迈的总理，深受感动”。这一切的重要背景之一是，法国和西德联合起来，对抗美国对西欧的控制。阿登纳最近虽然下台，但新上台的西德总理艾哈德一再表示：“我不打算采取新的执政方针”，“我们坚持旧方针”。

四、壟斷資本之間的劇烈鬥爭，使肯尼迪很難順利推行“靈活反應”戰略

肯尼迪的“靈活反應”戰略，如果只是在外面碰壁，里面順利的話，他也可能不會像現在這樣“不知所措”。問題是他推行這個戰略，在內部也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

肯尼迪的“靈活反應”戰略，要求對軍事的領導高度集中，“希望使總統在他的核機器上有一串按鈕，從開頭的嚴格的限制的戰術核戰爭，其間經過若干不同程度的戰爭，一直到最後的大決戰”，“也希望使總統有一部非核機器”，“希望使文職領袖，而不是軍事領袖從頭到尾掌握按鈕的工作”。事實却是，美國陸、海、空三軍之間以及它們同政府之間矛盾重重，很難達到肯尼迪所要求的那種高度的集中。

美國歷屆政府都有總的軍事戰略，但是，美國陸、海、空三軍在制訂和支配軍事預算時，卻盡量把本軍種的軍事思想和意圖摻到具體軍備計劃中去。例如，陸軍是根據“長

肯尼迪企圖以自己的核力量作為控制其西歐“盟國”的“王牌”，結果卻是使西歐“盟國”更加分裂。英國《經濟學家》周刊寫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處在混亂中，“似乎有着許多的小兵，需要一位好軍官的吆喝，來使他們重新排成整齊的隊伍”。若把北大西洋聯盟目前的状态，“比之于一面有着許多糾紛的裂紋的破鏡子；以致使人懷疑它，是否有一天還再全面和清晰地反映出一九四九年的團結來”。其實不必懷疑，這一天永遠也不會有。因為，正如這家刊物所說，“在一九四九年使聯盟保持完好的釘子是美國的核壟斷，這只釘子現在已被拔掉了”。

期的消耗戰”儲備軍事物資，而空軍則是根據“短期核突擊戰爭”來作準備；同時，三軍還各自發展多種多樣的導彈武器。這不僅在執行軍事戰略上，造成“混亂”，影響作戰效果，而且在備戰計劃上，形成嚴重的重複和浪費，加深了美國財政和經濟的困難。

肯尼迪上台以後，為了解決這些矛盾，實行“靈活反應”戰略，授權麥克納馬拉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實現”總統和國防部長對戰爭的絕對控制權，改組軍事指揮體系，剝奪三軍參謀長對武裝部队的直接指揮權；統一情報、通訊和後勤工作；掌握對重大武器體系的發展和採購的決定權，等等。

但是，肯尼迪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但沒有解決三軍之間和三軍同政府之間的矛盾，相反，進一步加深了三軍之間和三軍同政府之間的矛盾。艾森豪威爾政府時期，由於採取以戰略空軍為主的“大規模報復”戰



略，引起了陆军的反对。肯尼迪的这个战略，则使空军和海军都大为不满。前空军参谋长怀特一九六三年四月发表文章攻击麦克纳马拉，说他的战略思想“接受了”“核僵局”的局面，指责“新军备计划越来越依靠固定的、不灵活的、单一的武器，例如民兵和北极星导弹，并且主要强调常规力量”。海军参谋长安德逊对改组海军部削弱他的职权，表示强烈反对，因此遭到撤职处分。

麦克纳马拉加强对军队的集中控制，不仅加剧了美国各军种间利益的冲突，并且使美国国防部内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之间的传统性的权势之争，更形尖锐化了。美国军事评论家鲍德温说：“在所有三军中，特别是空军和海军中，过去两年里失望情绪日增”，“对国防部长权力显著集中的趋势相当不满。”美国一家报刊报道，五角大楼的一个军官说：“最惊人的事，是军人们竟然为一群从未上过战场，不认识战场为何物的小子所指挥。”美国《航空周刊》也承认，美国文职人员与军人之间的“裂痕”已“加深、加大”，成为“不可弥补的鸿沟”。

美国政府同陆、海、空三军之间以及三军内部的这些严重矛盾，决不是用“改组指挥体系”、“撤职处分”所能解决的。美国的军事战略，是由美国大垄断资本决定的。美国政府同三军之间以及三军内部的矛盾，实际上是美国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矛盾的反应，因此，是不可调和也无法解决的。

让我们听一听美国众议院军事拨款委员会成员惠吞的自白吧。惠吞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公开承认：“与军事开支有关的特殊势力，大概是美国国内政策和政治的最重要因素”；

“国家防务仅仅是决定防务开支时考虑的因素之一，而其他的因素则是：大量开支、扩大防务开支的受益面、照顾各军种、给所有承包商以适当的份额、使军事基地扩散到所有地区，等等”。

军火生产的利润比一般工业利润高一倍左右，因此，军火生产订货，是各个垄断资本集团最重要的争夺目标。美国垄断资本之间在争夺军事订货方面，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芝加哥太阳时报》写道：“在争取军火合同时有许多政治斗争。谁认为情况不是，那是十足天真的想法，……华盛顿到处是进行活动的人，纯粹是想得到这些合同。”

为了获得更多的军事订货，美国垄断资本家们，一方面派遣了自己的代表直接掌握军事部门，现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前任总经理；另一方面，他们收买大批现役军官，或把大批退役的军官安插在企业里，为自己拉生意。因此，美国陆、海、空三军将领，各有自己的后台老板。他们总是竭力突出本军种的地位及其拥有的武器的作用，激烈地争夺军事预算的份额，借以扩大与自己有关的军火商的利润。每一个军事将领，在实行某一战略时，都是以自己的后台老板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美国政论家希尔写道：“这种战神和财神之间的联盟是靠美元来巩固的。军事将领们在服现役时替军火大王们拉生意，而在退伍后则担任军火承包商的高薪职员。”据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调查小组的材料，美国有一千四百多名上校以上的退职军官，在一家最大的军事订货公司任职，其中包括二百六



十一名将级军官。制造导弹飞机和核潜艇的通用动力公司，雇佣退役军官最多，计有上校以上的军官一百八十七人。一九六二年，它获得的订货达十二亿美元以上。获得军事订货在十亿美元以上的洛克希德公司，雇佣上校以上的退役军官也有一百一十一名。

美国垄断资本除了直接同军事部门的将领官员勾结外，还运用所谓“院外集团”的活动，对两院进行控制。《芝加哥每日新闻》说，军火承包商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同它设有工厂的各州议员“保持接触”，有的议员“平均每天要接到防务承包商三次电话”，而国防部“每年要接到两院议员近五十万次有关防务计划的电话和信件”。

在争夺军事订货的斗争中，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演出了各种各样的丑剧。麦克纳马拉被逼得当众痛哭一事，是这方面的例子之一。

一九六二年，美国决定制造一批价值六十亿美元的 TFX 战斗轰炸机。波音飞机制造公司投标价格虽然比通用动力公司低，但麦克纳马拉却偷偷把这批订货给了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通用动力公司。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指出，制造合同之所以给了通用动力公司，“是因为它将在准民主党的得克萨斯州制造这种飞机，而如果是波音飞机制造公司获得了这个合同，那就会肯定是给共和党占优势的堪萨斯州提供好处”。

这件营私舞弊案件，引起了波音飞机制

造公司老板的恼怒。波音公司的老板马上通过自己在国会的代表，对麦克纳马拉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攻击他“试图在五角大楼建立一个王国”。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调查”时“询问非常严重”，麦克纳马拉当场“痛哭流涕”，“有一个人由于神经受不了而不省人事，在这次询问后需要作两周的治疗”，另外两个人表现出“极度疲倦的症状”。“在询问中甚至采用了‘陷害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说话严厉，连珠炮式的询问，打断讲话和要求对复杂的问题逐直回答‘是’或‘不是’。”

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报道，美国参议员杰克逊对“国家安全问题”作了一番“研究”之后说：“这种新的安排在整个购买武器过程中替政党分肥制度和贪污腐化开辟了道路，而且对武器质量也是个‘灾难性的打击’。”

显然，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使垄断资本的胃口越来越大，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反过来，垄断资本之间如此剧烈的斗争，又使肯尼迪很难顺利实现军事指挥上的高度集中，从而也很难顺利推行他的“灵活反应”战略。麦克纳马拉公开承认：“美国各军种对准备打什么样的战争具有不同的观念，结果，陆、海、空军指挥下的部队不能协调一致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效果。”

但是，这有什么办法呢？这是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五、美国人民不要炸弹，要面包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六年就指出：“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他们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他们从政

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美国人民应当起来抵抗美国反动派的进攻。我相信他们是会



这样做的。”^①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澤东同志的这个英明的預言。

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一方面使壟断資本的腰包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則使美国的經濟情况日益恶化，美国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美国人民不要炸彈，要面包；不要战争，要和平的呼声愈来愈高。

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間，強調在“財政力量許可的範圍內”进行扩軍备战，着重发展核軍备，削減常規兵力，但是仍然造成了巨大的預算赤字。肯尼迪政府为了实现“灵活反应”战略，既大力发展核軍备，又积极发展常規武力，結果使直接和間接的軍事預算开支大量增加。美国的軍事預算，一九六一年度为六百五十多亿美元，一九六四年度即达到七百七十九亿美元。

由于軍費开支浩大，美国的財政赤字更加膨脹，經濟情况日益恶化。肯尼迪执政三个年度的預算赤字将达二百一十多亿美元，几乎相当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八年的預算赤字。美国國債已由一九六一年年初的二千九百多亿美元，增加到一九六三年七月的三千零五十五亿美元。美国黄金大量外流，截至一九六三年八月底，美国的黄金儲备已降至一百五十五亿多美元，比美国所謂的黄金儲备的“危險点”还低二十四亿美元。由于通貨膨脹的发展，黄金外流，美元不断貶值，以一九三九年一美元为一百，一九六〇年三月跌至四十七点三，一九六三年跌至四十四。

美国壟断資本的殘酷剝削，早已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困苦，肯尼迪瘋狂扩軍备战和推行国民經济軍事化的結果，又进一步加

深了美国人民的苦难。一方面，工人遭受的失业威胁，日益严重。一九六二年，美国平均失业人数达四百零一万人。另一方面，广大工人階級不仅在軍火企业和一般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受到日益严重的剝削，承受大大加重的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作时间的痛苦，而且要負担扩軍备战带来的沉重后果。軍費开支的重要来源之一是稅收。据統計，美国人民的納稅負担，一九二九年每人平均为八十一元九角二分，一九六二年每人达六百六十六美元。人民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被大壟断資本通过納稅的形式捞走了。

美国广大工人生活日益困难，甚至肯尼迪也公开承认，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有三千二百多万人生活极为貧困。十分之四的中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失业失学的青年达一百万人。肯尼迪說：“我們仍然有一千七百万美国人每天晚上在营养不良的折磨下睡觉”，“餓着肚子上床”。

美国广大人民对这种恶劣的生活处境，忍无可忍，更加激烈地展开了反对核战争，要求和平，反对扩軍备战，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

几年来，美国工人的經濟性和政治性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据一九六二年統計，肯尼迪上台后的两年的时间里，美国工人罢工达六千九百多次，参加者达二百七十万人，罢工日数达三千五百三十万个。美国的和平运动已經具有全国規模。青年、妇女、黑人、

^① 《和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1頁。



科学家和社会名流等各阶层各界人士的和平组织，已经开始联合起来。广大人民公开拒绝执行肯尼迪的备战计划。

一九六二年二月，美国一百多所大学的五千多名学生向华盛顿进军，要求禁止核试验，结束军备竞赛。

同年四月，美国进行“民防演习”，在纽约有三千多人拒绝进入防空壕。哥伦比亚大学及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则举行“静坐示威”。

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机时期，美国人民反对肯尼迪政府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斗争，更加激烈，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干涉古巴。

肯尼迪政府对广大人民的争取和平的斗

争，企图进行镇压，但是，越是镇压，人民的斗争性越强。一九六二年三月，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妇女争取和平委员会负责人，指责该组织有“颠覆”活动的嫌疑。消息传出以后，全国有一千多名妇女自动赶到华盛顿为该组织辩护。

正如美国的一些报刊指出的，这些斗争“反映了美国人民的为和平与民权而采取积极行动的巨大潜在力量”。毫无疑问，美国人民的斗争，是阻止肯尼迪顺利推行它的“灵活反应”战略的一支强大力量。而且，可以预料，美帝国主义越是推行他们的罪恶的战略，美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也越是会进一步地广泛、深入和发展，斗争的胜利必然会越来越大。

矛盾重重、四处碰壁，这就是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的处境。肯尼迪这个美国垄断资本的宠儿，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纽约时报》写道：“华盛顿现在正流行一种怪疾”。这种“怪疾”是“肯尼迪当政头几个月的兴高采烈的兴头消失了，即使在今年一开头时十分明显的打算重新开始的情绪也为怀疑和不知所措所代替”。

美帝国主义的以美国人民为敌、以全世界人民为敌的“灵活反应”战略，已使它自己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它更加虚弱了。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等人，公开承认美国成了“上了年纪的斗士”，“自由世界”的权力，正“从美国分散出去”，“美国正在衰退”。

事实很明显，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是一条勒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这条绞索将会越勒越紧。美帝国主义的日子越来越不长了。

美帝国主义者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正在更加积极地制造各种各样的新式核武器，准备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推行他们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达到消灭他们的敌国，消灭世界革命，独霸全世界的目的。但是，美帝国主义越是疯狂，就越要加深它在各方面的矛盾，促进人民的革命斗争。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只要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加紧进行革命斗争，就一定能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制止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股革命的火焰在燃烧

——讀反映美国黑人生活与斗争的文学作品

施 央 千

今天，一个强大的声音响彻云霄，激动人心。这声音就是受了数百年奴役和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争取解放的呼声。非洲的黑人，拉丁美洲的黑人，美国的黑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反对种族歧视的旗帜，擂起民族解放的战鼓，唱出时代的强音。从美国、拉丁美洲到非洲，一股黑色的革命火焰正在燃烧，越燃越旺，已经包围了奴役和压迫黑人几世纪之久的以美国为首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的寿命已经不长久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中所指出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和拉丁美洲黑人的斗争、非洲黑人的斗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也是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正义斗争反映在文学作品里，也强烈地感染着读者，让人们看到正义斗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反映美国黑人生活与斗争的黑人文学，是随着美国黑人的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进步和解放的斗

争而产生和发展的；它的主流，无论在哪个时期，总是健康的、革命的。进步的美国黑人文学，忠实地反映了长期以来被压迫、被奴役的美国黑人的悲惨命运和他们的觉醒。它的优秀作品是勤劳勇敢的美国黑人的理想与智慧的结晶，是美国进步文学宝库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美国黑人女作家、杜波依斯夫人雪莉·格雷汉姆指出：“要是没有黑人的丰富多采、生气蓬勃和优美的诗篇与歌曲的话，美国文学在广度、质量与数量三方面都远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黑人对文学所作的贡献，加上描写黑人生活的文学作品，构成了美国文学的主要部分。”^①特别是优秀的黑人诗歌具有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它们像火焰，燃烧着读者的心，像战鼓，鼓舞着人们前进。

但是美国的黑人文学，在美国向来是受到歧视和迫害的。“直到现在，一个黑人想要出版一个作品，不管他写的是历史著作，是小说或者是诗，都立刻会被贬到‘隔离’的‘第二等’的地位。……黑人写的所有的作品

^① 雪莉·格雷汉姆：《美国文学中的黑人》。见《世界文学》1959年5月号。



都不分好坏地被扔到标为‘黑人宣传’或者‘黑人的民间艺术’那一堆东西里去了，因此也就很难会被认为是文学。”^①

中国人民一向关心被压迫、被奴役的黑人弟兄的命运，同情他们的悲惨遭遇。早在一九〇一年，林紓、魏易合译的美国白人女作家斯陀夫人的小说《黑奴吁天录》（原书的书名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后，即引起广泛的反响。那时中国人民正受着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这部描写黑奴痛苦生活的小说（尽管它在主题思想上和黑人形象塑造上有很大的缺陷），在当时能受到中国人民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小说后来还被改编为剧本，从一九〇七年起先后在留学生界和上海等地演出，一九三二年还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的瑞金上演过。一九五七年在中國話剧运动五十年紀念的时候，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又重新编写剧本，改名为《黑奴恨》，在北京等地演出。剧作者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写的后记中说：“现今，在美国，黑人还是受到严重的歧视和压迫。黑人的生命财产、基本人权都无保障。……我以对被压迫者深切的同情，对殖民主义者极端的愤慨写了这个戏……”^②

今天，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正以排山倒海的英雄气概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时刻都在深切地关怀那些尚在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痛苦生活的黑人弟兄，我们始终全力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珍视和欢迎反映他们生活和斗争的作品。目前我国已陆续翻译出版的美国黑人文学作品

中，在体裁上，有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有诗歌、散文，有文学传记；在题材上，有反映惨绝人寰的黑奴生活的，有揭露骇人听闻的法西斯暴行的，有描写可歌可泣的英雄和他们所进行的斗争事迹的。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美国反动派加在黑人弟兄身上的种种暴行，也看到了黑人坚强勇敢、前仆后继的斗争。

在美国进步的黑人文学作品中，反映了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揭露了殖民主义者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贩卖黑人奴隶的罪恶活动。在波浪滔天的大西洋上，一艘艘的奴隶船扬帆西去，把黑人从非洲运走。正如美国黑人诗人布朗所描写的那样：

他们强拉你们离开自己的故土，
把你们连锁在一起，
塞进肮脏的仓口，像重迭起来的
的匙子，
他们贩卖你们，为了几个绅士
的安逸。^③

已故的著名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指出，每运一个黑人奴隶到美洲，至少要有五个黑人死在非洲或船上。当时，在黑非洲通向海口的道路上，到处白骨累累。自由的非洲黑人被迫在美国南部的种植园里当奴隶，过着暗

① 雪莉·格雷汉姆：《美国文学中的黑人》。

② 《黑奴恨》，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

③ 《黑人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



无天日的生活二百余年之久。根据殖民者的法律，奴隶不是人，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可以随意鞭撻和虐杀黑人，可以任意蹂躏黑人女奴隶。美国南部大庄园里的珠光宝气，正是建筑在黑人奴隶的鲜血和尸骨之上。美国黑人奴隶所受的非人待遇和他们要求解放的渴望，不仅是许多黑人民歌（如《奴隶的锁链》等）的主题，而且也是美国进步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题材。美国一些资产阶级进步作家，都对深受痛苦的黑人奴隶表示同情。马克·吐温在他的短篇小说《一个真实的故事》里，希尔德烈斯在他的长篇小说《白奴》里，对奴隶主的残忍、奴隶所过的非人生活、蓄奴制和奴隶贸易等都作了真切的描写，揭露了那个时代美国野蛮的种族压迫的真相。因反对蓄奴制而受到迫害的诗人惠特曼，在他的《自己之歌》、《埃塞俄比亚人向旗帜致敬》等诗中，不仅对黑人奴隶的处境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而且对他们的反抗斗争作了热情的歌颂。诗人朗费罗，在他的诗集《奴役篇》里，展示了一幅幅关于黑人奴隶痛苦生活的悲惨画面，在《警告》一诗中还指出被压迫被奴役的黑人，将有一天像《圣经·士师记》里所写的被侮辱的大力士瞎参孙一样，挣脱身上戴着的铁锁钢镣，奋不顾身地举起臂，把这个国家制度的基柱动摇。

被压迫被奴役的美国黑人，决不能安于奴隶的命运，长期以来，他们在极其艰苦的境况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威廉·福斯特称这一斗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诗”^①，

而这部英雄史诗的第一章，就开始于黑人奴隶们的反抗斗争。在优秀的黑人文学作品里，生动地再现了美国黑人奴隶为粉碎奴隶的枷锁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壮丽画面，塑造了富有艺术光彩的叛逆者的英雄形象。美国黑人诗人罗伯特·海登在《加布瑞尔》的诗里，歌颂了领导奴隶起义的美国黑人英雄加布瑞尔的诗中写出：“加布瑞尔吊在绞架上，那是乌金閃射着光芒，他的头颅，像起义的火把……”，加布瑞尔所“发动的起义，决不会徒劳……定会再度掀起风暴”^②。雪莉·格雷汉姆在她的文学传记《从前有个奴隶》里，也描写了黑人奴隶反抗白人奴隶主的斗争，歌颂了这一斗争暴风雨中的闪电和雷鸣，再现了奴隶出身的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英雄形象，反映了黑人要求自由、要求解放的革命意志。

在美国黑人奴隶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有许多进步的白人跟黑人团结在一起，进行了英勇的战斗，这在美国黑人文学中也有深刻生动的反映。以参加黑人解放斗争杰出的英雄人物约翰·布朗为例，约翰·布朗是个出身贫寒的白人，但他在生活和斗争的实践中，把自己的命运和黑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为黑人和白人携手向共同的阶级敌人作斗争提供了光辉的榜样。从杜波依斯的文学传记《约翰·布朗》中，我们看到了约翰·布朗怎样把他的一生和一家，全都贡献

① 《美国历史中的黑人》序言，三联书店1960年版。

② 《黑人诗选》，第80页。



給黑人的解放事业，最后自己也在絞台上英勇就义。

可是，美国南北战争甫告结束，美国黑人洒在战场上的鲜血未干，北部的工业资本家已与南部的种植园主勾结起来，用更残酷的手段来剥削和奴役黑人。反映这一时期的黑人真实生活的作品，在美国进步文学中相当丰富，读了令人义愤填膺。加德维尔在他早期的小說里，以不少篇幅反映了受到白人地主奴役压迫的黑人佃农的痛苦生活。父亲因为不忍看着自己的女儿挨饿，最后用猎枪打死了女儿，自己也被送进监牢（《女儿》）^①；一家黑人佃农一连饿了好几天，他的老父亲饿急了，夜间出去找吃的，不幸找错了路，掉进地主的猪圈，被一群凶猛的公猪撕得粉碎；另一个黑人青年激于义愤，顶撞那个地主几句，竟被一群白人暴徒用乱枪活活打死（《跪在上升的太阳下》）^②。

美国黑人文学作品，还无情地揭露了反动种族主义者怎样随便捏造罪名来加害无辜的黑人，用各种合法化的私刑处死、屠杀赤手空拳黑人的事实。许多美国黑人作家，如朗斯敦·休士在小說《家乡》和《父与子》里，克劳德·麦开在《私刑》的诗里，都以充满愤慨的笔触，深刻地揭露了白人中的种族主义者怎样捏造罪名和运用私刑虐杀无辜黑人的各种罪行。美国南部有各种各样的迫害黑人的恐怖组织，其中罪恶昭彰的是三K党。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重建》一书中，这样描写了三K党的活动：“……有组织的蒙面、携带武器的人群，入夜以后在乡村中到

处横行，一路上鞭打、射击、伤害、残杀妇女、儿童和赤手空拳的男人，或者砍去他们的四肢，他们以暴力冲进睡着了的人们的家里……用手枪、来福枪、刀和绳子胡干。为许多目击者所证实了的这类罪行，就是路易西安那州用来选举美国总统的办法。”曾经震惊世界的斯考兹勃罗案件，即阿拉巴马州斯考兹勃罗城的九个黑人青年被一群种族主义者诬告强奸两个白人妇女，虽然他们连那两个妇女的面都不曾见过，而且其中的一个妇女后来都亲口否认了这种控告。但这九个黑人青年仍全被美国反动当局无理判刑，其中的一个黑人青年贝特逊曾三次被判死刑，后来由于全国进步人士及世界舆论的声援，才被改判七十五年徒刑。贝特逊在牢里共关了十八年，于一九四八年越狱逃出，写成《斯考兹勃罗案件》一书，将他本人和他的黑人同胞遭受迫害的经过以及美国监狱中的种种黑暗情形暴露于世。作者在结尾时写道：“我经过了一场很大的斗争。但是，我要全世界知道，我并没有屈服。”^③

美国的统治阶级强加于黑人的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在黑人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哥伦比亚的黑人作家萨巴达·奥利维雅在他的《我看到了黑夜》一书中，描写了他在美国旅行时所受到的种族歧视。黑人不能和白人一同乘车，也不能在白人餐馆里吃饭。一个抱着婴儿的黑人妇女从火车上下

①② 《美国黑人生活纪实》，三联书店1961年版。

③ 《斯考兹勃罗案件》，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354页。



来，因为找不到为黑人特設的餐館，不但自己找不到吃的，也沒有东西可以喂她的黑女孩。朗斯敦·休士在他的小說《一个星期五的早晨》里，描写了有天才的黑人学生仅仅因为肤色的关系，被剝夺了領取奖学金的权利，那些評判老爷們只是在获悉得奖的是个黑种女孩子之后，才在最后一分钟改变决定，把奖学金另授給別人①。

美国統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竭力粉飾国内种族歧視和种族压迫的殘酷现实，大肆吹噓什么美国的所謂民主和自由，胡說什么美国黑人可以从宪法中得到人权的保障和享有黑人的公民权利。而在进步的美国黑人文学作品中，却无情地撕下了美国所謂民主和自由的假面具。詩人戴維斯在《南方产棉区的画像》詩中写道：

这里有最充分的民主

.....

“人人可以做总统”

“机会均等”

这些，翻譯出来是——

富人越来越富

大农场主的土地越来越多

他們控制着土地和市鎮

主宰着他們的傀儡官吏

.....

沒有选举权的黑人永远得不到

与他們繳納的捐稅相称的报酬。②

从优秀的黑人文学作品塑造的黑人英雄

形象，和所描写的日趋激烈的斗争中，我們看到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們反对种族歧視、爭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日益发展。許多黑人虽遭到美国反动当局的殘酷迫害，但他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甚至在监牢里依旧进行着不屈的斗争。美国黑人作家劳埃·布朗的长篇小说《铁城》，就描写了黑人共产党员在监牢里为援救另一个无辜被判死刑的黑人青年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契斯納特在长篇小说《一脉相承》里，塑造了一个主張武装自卫和敢于斗争的黑人英雄形象。他說出“与其像狗一样地活着，不如英勇地死去”这样的豪言壯語，并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这一光輝的黑人形象給讀者留下鮮明、强烈的印象。

从美国黑人文学作品中我們还看到，美国黑人的斗争經驗和阶级觉悟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提高，許多人懂得了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詩人罗伯特·海登在《演說》一詩中，揭穿了美国反动派分化美国无产阶级的詭計：

听我說，黑人弟兄們；

白人弟兄們，听我說：

我听見他們說了许多話——

全是为了分化你們

在你們中間安起一道铁刺网，

我听見他們說——

① 《黑人短篇小说选》，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② 《黑人詩选》，第60、63頁。



“髒黑人，旁白人”

这是同一个声音說的……①

优秀的美国黑人文学作品中所揭示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已越来越尖锐深刻，人物形象也越来越血肉丰满。黑人作家基倫斯在五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揚布拉德》一书中，刻划了一个有觉悟的黑人工人家庭的形象——揚布拉德一家，并通过这个家庭，反映了美国新生一代的黑人的觉醒。在基倫斯笔下的黑人罗伯特，不但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同时还不屈不挠地跟美国工人阶级弟兄在一起直接参加了阶级斗争。杜波依斯的长篇小说《黑色的火焰》三部曲，更是美国黑人文学进一步成熟的标志。这部宏伟的巨著概括了近百年来美国黑人遭受迫害和进行英勇反抗的悲壮历史，揭示了黑人民族在历史潮流冲击下逐渐觉醒的过程。作者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还以极大的热情欢呼新中国的诞生，谴责了美国反动派发动的侵朝战争，歌颂了黑非洲的觉醒，把黑人的解放事业与全人类的整个进步事业联系起来。

美国黑人在斗争中前进着。他们的斗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人民的支持。海地诗人让·布里埃尔在《我同你在一起，哈列姆！》的诗中，强调受压迫的海地黑人和美国黑人之间“虽然隔着关山重重，但是咱们有共同的爱，也有共同的恨”，当美国黑人“在佛罗里达遭到毒打时”，“一刹那間，我的头巾也同样浸透

了鲜血”②。印度尼西亚诗人里沙哥达在《寻找自由的人们》的诗中热情洋溢地歌唱，

啊，斗争的人们，
爱好自由的美国黑人，
起来吧，只有用流血的斗争才能把
自由夺到手中！③

加納诗人乔治·阿翁納尔·威廉斯，也在《黑色的鹰觉醒了》的诗中，表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的热情支持：

自由的呼声响彻广大的土地，
鼓依旧在咚咚地敲响，
从纽约港的所谓“自由法令”下面，
黑人弟兄们要求自由的呼声傳到了
我們这里，
哟！哟！哟！
同我們的鼓声远远地呼应。④

我們深信，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必将取得彻底的胜利，而反映这一正义斗争的美国黑人文学，在革命火焰的强烈光芒照耀下，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深切关怀下，必将开出更加美丽灿烂的花朵，唱出更加嘹亮雄壮的歌声！

① 《黑人诗选》，第81--82页。

② 《我們的怒吼》，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129页。

③④ 《人民日报》，1963年8月27日。



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为《社会主义古巴》而作)

薄 一 波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伟大历史任务。

旧中国的经济遗产是极端落后的。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基础非常薄弱。主要的工业，是一些棉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等轻工业；只有很少的重工业，那是帝国主义为了掠夺我国资源而举办的极少的采掘、冶炼工业和只能担负修理、装配任务的机械工业，部门残缺不全。无论轻工业和重工业，绝大多数都被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所控制，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与此相适应，工业的地区分布也极不合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业集中在少数沿海城市。这种情况，使我国百余年来，国弱民穷，受尽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

在反动派统治的年代里，多少中国人想“工业救国”，希望把自己的祖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但是都成了梦幻泡影。我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清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才有可能实现把自己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理想。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很重视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号召全国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我们立即没收了蒋介石反动政府所经营的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变为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我们分别地采取作价收购、管制等办法，也把它们逐步地转变为我国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同时，我们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彻底消灭了统治我国农村几千年的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经过两年多的工作，我们在一九五二年底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实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期间，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了由六百多项重点工程组成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初步基础，并且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大发展，我国广大农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进一步地联合成为人民公社。

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工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

过去，我们没有拖拉机制造业、汽车工业、造船工业、航空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精密机床制造业、精密仪表制造业和化学合成材料工业等等；现在，这些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说，我国工业部门不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

过去，我们的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自己不会设计，主要是利用外国的设计；现在，我们已经从仿造发展到独立地进行设计。过去，我们只能制造技术比较简单的中、小型设备；现在，已经能够制造一部分大型的、精密的设备。过去，我们的许多重要建设工程，是由兄弟国家帮助设计的，并且供给主要的或者全套的设备；现在，许多重要建设工程，如年产一百万吨煤的现代化煤井、年产一百五十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合成氨二万五千吨的化学肥料厂、重型机械厂、设备容量六十五万千瓦的发电站，等等，我们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并且依靠本国的技术力量建设起来。这就是说，我国工业建设的技术力量大大地增强了，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了。

由于新的工业部门的建立和技术力量的增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设备和材料的自给程度也大大提高了。机器设备的自给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百分之五十五左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钢材的自给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左右。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已经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我国工业的分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过去，我们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几个城市；现在，不仅沿海这几个城市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全国各个省、自治区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现代化的工业。过去，我们只有鞍山钢铁公司这个大型的钢铁工业基地，而且这个基地也没有完全建设好；现在，不但完善地建设了这个基地，而且在武汉、包头等地建立起新的钢铁工业基地。过去，我们的电力工业集中在少数城市；现在，全国各个大、中、小城市以至若干农村都有了不同规模的发电站。过去我们的纺织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几个沿海城市；现在全国很多省份已经建起新型的纺织厂。这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的国家里，各个地区的工业都有了普遍的发展。

十几年的时光，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只是一瞬间，而我们所取得的工业化的伟大成就，却是我国以往的历史不曾有过的。我国工业建设的伟大成就，甚至连我们的敌人——



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了。事情正是在这样发展着：中国的衰弱，迅速走向它的反面——强盛。我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我们的国际的朋友为此感到高兴。

当然，我们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同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争取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把包括农业在内整个国民经济转移到现代技术基础之上。这就是说，我们要使我国重工业生产的原料、材料和各种机器设备，能够适应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技术改造的需要，能够适应我国国防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要使我国轻工业生产的各种消费品，能够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会有种种困难，但是，困难从来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我们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勤劳勇敢的六亿多人民，有久经考验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切内部条件。同时，我们还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世界人民的支持。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一定会比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快得多。过去，我们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今后，我们也一定能够以同样的跃进速度，在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二

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以能够比较快地发展，除了上面所说的各种有利条件以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找到了一条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这样阐述过。他说：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这三个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的发展关系，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实践中充分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够孤立地进行的。必须是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也就是说，它们应当在发展中相互适应，而不是彼此脱节，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度按比例地向前发展，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改善人民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过去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经常地教育干部，坚持我国工业化的道路，防止和纠正了在具体工作中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或者只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片面做法，因而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地对待农业的发展，这是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所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在我们这样有五亿几千万农民的国家里，农民的状况如何，农业的状况如何，对于工业化的进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系极大。

我党中央总结了我国建设的经验，明确地提出农业是我国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六亿多人口的基本生活资料，主要是由农业提供的。农业又是我国轻工业的主要原料基地和一部分重工业辅助原料、材料的来源。我国工业化所依靠的是国内市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的主体，是在农村。发展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是来自农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大量资金，是依靠国内积累的，它的很大一部分是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来自农业。所有这些，都是农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的表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把广大的农民同盟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首先是工业部门的支援下，大力发展农业，大大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能够供应城市越来越多的商品粮食和副食品；就能够供应工业越来越多的棉花和其他原料；就能够从农业中腾出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中来；就能够动员广阔的国内市场对于工业提出巨大要求，吸收大量的重工业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就能够为工业建设筹集充裕的资金。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促进而不是延缓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大有利于改善全国人民生活 and 巩固工农联盟。

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包含着这样两方面的要求：第一，工业的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应当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基本上相适应。第二，工业在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中，应当以农业为主要对象。无论轻工业和重工业都必须以广大农村为主要市场，重工业尤其应当把支援农业技术改革作为首要任务，使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密切结合，互相促进。实践告诉我们，我国的工业化只有沿着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前进，同这两方面的要求相适应，它的方向才是正确的，它的前途才是无限广阔的。

我们强调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工业，这同以重工业为中心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以农业为基础，丝毫也不意味着削弱重工业的发展，恰恰是为重工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直接要求逐步建立起作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的强大的工业，首先



是建立起生产资料的主要生产部门——重工业。因为，只有重工业发展了，生产资料得到优先增长，才能够实现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才能够为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和为国防力量的增强，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对于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才能够充分发挥。如果我们不去花很大力量建立起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以及其他重工业，我们就得不到必要的各种机器，得不到必要的钢材和建筑材料，得不到必要的电力和燃料，我们就无法装备农业、轻工业、运输业，我国的国民经济就将长期陷于落后的境地，我们也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的国防。

在我们这样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农业国里，而且又处在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势力、战争势力作斗争的前线。我国人民对于发展重工业的要求，是很迫切的。我们党完全理解人民的这种愿望，一贯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在过去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在工业建设中正是把主要力量放在重工业方面，在我们建设的重大工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工业企业。这是完全必要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那种把我们反对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做法，认为是对重工业的忽视，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或者曲解。

在实践中，我们也体会到，根据原料、资金的可能和市场的需要，积极地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它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但无害，而且有利。

人们知道，工业不仅担负着提供劳动手段的任务，而且担负着提供消费品的任务，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工业的这种任务是很重的。积极地发展轻工业，就可以活跃市场，保持物价的稳定，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使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人民的切身利益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这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不仅如此，轻工业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密切地联系着农业和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将以日益增多的轻工业品，去同农业方面交换更多的农副产品，推动农业生产，支援工业建设。轻工业也是积累建设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轻工业有着建设较易、投资较少、见效较快、赢利较多的特点。同时，轻工业的发展又需要从重工业部门吸取大量的原料和机器设备，这又可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我国工业化的经验证明，那种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以为积极地适当地发展轻工业不是促进而将妨碍重工业发展的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我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还包括着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内容。

在我国，中央工业一般地是大型企业，它们是建立工业体系的骨干力量；地方工业一般是中、小型企业，它们是建立工业体系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从管理体制上、生产规模上、以至工业布局上，正确地处理中央工业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同中、小型企业的关系，使它们都有计划地发展，以迅速增强工业生产能力，改善



工业布局，促进城乡结合，加速农业技术改革的进程，从而大大地缩短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个问题上，那种片面强调发展中央工业和大型企业的做法，以及那种不顾国家统一规划盲目地发展地方工业和小型企业的分散主义做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都是不利的。

三

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工业化，是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主要地依靠外援呢？我们坚定地采取了自力更生的方针。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当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来进行建设，在我国更是如此。人们知道，我国有六亿五千多万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又是一个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如果依靠大量地进口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来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那是不可想像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只有依靠我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资源，发挥本国的一切潜力，才能够迅速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工业，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才能够使整个国民经济具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国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贡献我们的最大力量，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才能够更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是怎样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推进工业化的呢？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巨额的建设资金。我国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内部积累。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我国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在国民收入日益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条件下，我们适当地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我们在一切机关、企业、学校和广大群众中，坚持提倡勤俭建国、厉行节约的风尚，把可能聚集的资金都积累起来。我们充分地注意合理地运用资金，竭力避免浪费，尽可能用较少的财力、物力、人力，办较多的事情。

同时，我们也经常地注意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这两部分的关系，使集体的长远的利益和个人的当前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使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正确地结合起来。

自力更生地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迅速提高我国工业技术的水平，增加产品的品种，逐步地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设备、原料和材料的自给程度。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注意正确地处理工业产品的数量和品种、质量之间的关系，使工业产品数量的增长同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适当地结合起来，防止和纠正只顾数量，忽视品种和质量的偏向。为了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迅速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不断地加强了科学实验工作。

自力更生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还要求加紧培养建设人材，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具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队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



方面，我們有计划地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材；另一方面，我們积极地举办业余文化、技术学校，不断地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业务水平。

在調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我們也努力爭取并且也得到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国际兄弟的支援。我們学习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經驗，努力加强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相互支援。同时，我們也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了同那些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貿易往来。这种情况表明，我們所实行的自力更生的方針，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援，是統一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和发展国与国之間的經濟往来，也是統一的。那种脫离社会主义陣营的“单干”、“民族閉关自守”等等說法，同我們实行的自力更生的方針，是毫不相干的。

四

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我們不断地加强了党的領導，这是我們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对經濟建設的領導，最主要的是政治上、思想上、方針政策上和組織上的統一的領導。我們党不但提出了工业化的方針路綫，而且不断地同离开党的正确路綫的右的或者“左”的傾向进行斗争，以保证党的路綫的正确地貫徹执行。

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场偉大的生产斗争，这场生产斗争是同階級斗争交織着进行的。我們在一九五六年对資本主义生产資料所有制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七年又粉碎了資产階級右派的猖狂进攻，因而在經濟战綫上、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但是，在我国，仍然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資产階級中抗拒改造的分子，被推翻的地主階級，他們不甘心于本階級的灭亡，总是企图复辟。小資产階級自发势力，經常产生新的資本主义分子。由于資产階級的侵蝕和小生产者自发势力的影响，在我国工人階級队伍中，也有极少数不坚定的人，蜕化变质，成了新的資产階級分子。同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又在极力散布他們的影响，甚至妄图顛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階級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階級同資产階級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将存在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在生产斗争中，忘記或者忽視階級斗争，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們党不断地对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人民进行階級和階級斗争的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們的階級觉悟，提高他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防止和克服資产階級思想的侵蝕，并且对反动階級的复辟活动給以坚决的打击。

为了保证党对工业建設的領導，在我国的工业企业中普遍建立并且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組織。



企业党的委员会是企业中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在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方面，我们实行企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种领导制度规定：在企业中一切重大问题都应当由党委集体讨论和决定，有关生产行政工作由厂长负责执行。这种领导制度，一方面，继承了我们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传统的领导制度；另一方面，它又适合于现代工业企业生产需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特点。实行这种制度，既保证了党委对生产行政工作的领导，同时也充分发挥了行政负责人和行政部门的作用，并且可以使企业领导人在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不犯或者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

我们党的领导，是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贯坚持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正确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践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党是紧紧依靠着工人阶级来管理企业的。我们在企业中普遍建立了工会组织，开展各种活动，发动职工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提高职工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我们在企业中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了各种民主管理制度，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讨论和解决企业中的重要问题，吸收群众参加管理和监督行政工作。

我们在企业中所实行的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同那种“工人自治”的虚伪口号和错误作法是相对立的；我们的集中，又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这又同那种片面地依靠行政命令、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作法，有根本上的区别的。

我们在企业中普遍地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包括专业管理人员）、工人群众“三结合”的办法，使领导和群众结合起来，技术理论知识 and 劳动实践结合起来，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这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推行“三结合”的过程中，领导干部和管理干部参加部分生产劳动，工人参加部分日常的生产管理。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干部要不要参加一部分生产劳动，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它关系到干部究竟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还是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脱离群众。参加劳动，可以使干部保持普通劳动者身分，不闹特殊化，避免脱离群众，是保证干部不致蜕化变质的一个根本条件。干部参加劳动，还可以使干部同生产实际密切联系起来，使干部能够及时发现生产的积极因素，能够洞察生产中的问题，同群众一起想办法加以解决，避免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错误。

就工人群众说，参加一部分日常生产的管理，也有利于提高他们的主人翁的责任心，发扬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逐步掌握管理企业的力量。我们有许多干部就是从普通工人中锻炼和选拔出来的。

实践证明，实行“三结合”，还大大有助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创造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互助团结向上的关系。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能不具有深远的意义。

